

唐兰早期甲金学研究表微

——以唐兰致刘体智书札二通为中心*

张 涛

内容摘要:1934年,在北京大学等学校任职的青年学者唐兰致函给大收藏家刘体智,就刘氏所藏矢令尊、曾姬无恤壶等新发现的青铜重器有所讨论。唐兰并称已与安徽图书馆商定去整理寿县出土青铜器,此事在唐复年、唐益年所编《唐兰年表》中无载。另外,唐兰还提到整理的北京大学藏甲骨即将出版。由此线索,可以考知出现于“中国书店2012年秋季书刊资料拍卖会”上的唐兰手稿至少应该包含唐兰未刊稿《北京大学研究所藏甲骨刻辞》的部分内容。唐兰致刘体智书札对了解唐兰早期甲骨、金文研究具有较高价值,目前尚有两通保存在刘氏后人手中,鲜为学界注意,可补《唐兰全集》之不足。

关键词:唐兰 刘体智 甲骨 金文 书札

近年整理收藏大家刘体智相关文献,汇集为《小校经阁遗芬》一书拟出版,因便获读文字学家、古史学者唐兰致刘氏的书信二通。唐兰一生大部分著述,都已收入新出《唐兰全集》^①,但《全集》书信部分收录信函凡13宗,内中并无刘体智,则此二函实为唐兰集外佚札。

刘体智(1879-1962),字晦之,安徽庐江人,为晚清重臣刘秉璋第四子,民国以后一度活跃于金融、收藏两界,其《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善斋吉金录》素为学界所重。唐兰(1901-1979),号立厂,浙江嘉兴人,以研究铜器、甲骨而与刘氏有所交往。两信均寄自“北平外交部街甲二号”,在今东单协和医院以东,唐兰初至北平时曾在地安门内米粮库6号当租客,后因在1934年春娶妻,乃迁居外交部街。二函即写于迁居后不久。此时的唐兰不但个人生活开始安定下来,而且其学术生涯也迈上了新的台阶,这两封写给刘体智的信件刚好提供了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仪礼》复原与当代日常礼仪重建研究”(14ZDB009)阶段性成果。

①唐兰:《唐兰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若干细节。

一(图见封二)

唐兰致刘体智第一函云:

惠之先生雅鉴:

前者尊驾来平,席前一晤,未得鬯谈为憾。比者仆撰《寿州所出楚铜器考略》(此文将由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表),深以未得尊藏两壶一匕之拓本与照片为恨,如蒙慨然惠赐,感激无似!又楚器在上海者,已见楚王酈肯鼎一器之照片,如先生知尚有他器,能以见告,或可以拓本及照片惠借一用,尤所企盼!拙著两册,另函附上,请教之。《矢彝考释》将由《国学季刊》发表,出书后当再寄呈也。此致,敬请道安。

唐兰顿首,八日。北平外交部街甲二号,唐立厂。

秋间与安徽图书馆约定,往整理楚器。道出沪上,当再奉访也。

此信开头说“尊驾来平,席前一晤,未得鬯谈为憾”,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刘体智正处于在金融界大展身手之际,他在姻亲周学熙创办的中国实业银行中先任董事,后任上海分行行长,1932年做到了总经理的位子。中国实业银行总行设在天津,随后陆续在北京、济南、上海等地设立分行,刘体智打理银行业务,故时常往来于平津沪之间。虽是公干,但他也常借出差机会满足自己收藏的兴趣;许多学者希望获见平常秘不示人的珍贵藏品,更是热衷于与大收藏家结交,像容庚、商承祚还有徐中舒等人,就是在1930年代初与刘体智结识的。而唐兰,其实还与刘体智有另一层联系。唐兰到北平以前,从1924年便开始在天津周学渊家任家庭教师,周学渊即周学熙之弟,于刘体智也是姻亲。不过刘唐二人相识似乎并不早,交情不深。唐兰所云“席前一晤”想是双方在北平初见,而这封信似乎是二人第一次通邮。

唐兰提到,他有两篇论文将要发表,分别是《寿州所出楚铜器考略》和《矢彝考释》。《矢彝考释》是简称,1934年见刊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四卷一期,题《作册令尊及作册令彝铭考释》。照理,本期《国学季刊》应出版于当年第一季度,但似有延迟,唐兰此文文末附记有“此文既印成”、“七月六日又记”字样可为印证^①。这封信大概就写于这一年的6月8日。矢彝,又名矢方彝、令方彝、令彝或矢令彝,是有180馀字铭文的西周重器,传1929年夏出土于河南洛阳北邙山马坡。这是一件相当重要的青铜器,当时即受到学界和藏家的瞩目。唐兰本人先后撰有相关文章多篇:最初在为天津的《商报》编辑《文学周刊》时,曾在1929年11月26日第8期编发了罗振玉的《矢彝考释》,随后他自己就在12月3日同刊第9期发表了《书罗叔蕴先生所著矢彝考释后》,到了1930年3月,他又接连在该报撰写《跋矢彝考释质疑》、《矢彝之又一考释》等文,足见用力之

^①唐兰:《作册令尊及作册令彝铭考释》,《唐兰全集》第1册,第395页。

深。其他如鲍鼎、郭沫若、吴其昌等学人对此都有所论列。而唐兰这组文章的重要之处在于,这虽然是他首次撰写金文方面的论作发表,但是已在罗振玉的基础上明确论证了“京宫”和“康宫”的重要问题,指出其应是西周诸王宗庙,可谓一大发现,正如刘雨所指出的,“这是他晚年全面阐述西周金文‘康宫原则’的滥觞”^①。唐兰自己在《天壤阁甲骨文存并考释序》中也回忆自己在这时期“始重理考证之学”^②。1934年这篇《作册令尊及作册令彝铭考释》则是他的又一力作,对铭文进行了系统疏解。

唐兰之所以特别提到这篇文章,并不只是因为这封信写于文章即将刊发之际,更主要的原因是,与矢彝同地出土的还有一件铭文大致相同的矢令尊,当时就在刘体智手中,刘氏著录自家藏品的《善斋吉金录·礼器丙》中,此器题曰“矢尊”^③。而唐兰此前撰写的《跋矢彝考释质疑》,是针对鲍鼎《矢彝考释质疑》所作的反驳文章,鲍鼎则是刘体智铜器整理者。唐兰对此自了然于心,《作册令尊及作册令彝铭考释小引》就有“二器同文。尊在庐江刘氏善斋,彝藏美国华盛顿Freer Gallery of Art”之语^④,所以在信中又特别提及,并许诺“出书后当再寄呈”。

此函提到的另一篇文章《寿县所出楚铜器考略》,正式发表时题为《寿县所出铜器考略》,与《作册令尊及作册令彝铭考释》刊于同一刊物的同一期。安徽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今属长丰县朱集乡)楚王墓1933年7月5日被盗掘,至1934年间续有古物出土,大部分被安徽省政府扣下,后归省立图书馆保管,但流入其他学术机关及私人藏家者也不算少,尤为其中精品。在《寿县所出铜器考略》一文中,唐兰总结道:“其四散者,一部在上海,庐江刘晦之氏藏有曾姬壶二器,又勺二,见《善斋吉金录》。又有楚王欽肯鼎一器,郭沫若氏曾以照片见寄,今不知在何许。其又一部在天津,鼎一、豆二、簠二、簋二。曾得照片,独鼎附铭拓,为楚王欽忌所作。馀器亦当有铭,惜未得拓本也。其又一部在北平者,估人李氏有楚王欽肯钲鼎,为古物保管委员会截获,已赎归安徽图书馆。尊古斋有楚王欽章剑一、楚王欽肯簠三、楚王欽忌盘一、又壘一、豆二、勺二。其勺一,曾归友人于君思泊,见《双剑谿吉金图录》,今为容君希白所藏。馀器闻亦将归图书馆。余承马叔平先生及王述人先生之嘉贶,得尽有此一小部分之拓本及照片……而散在平、津、沪三处者,实此次发见中之较重要部分。”^⑤尊古斋是黄浚(伯川)在琉璃厂经营的古玩铺,这年5月,尊古斋所藏寿县铜器正在北平团城“西北文物展览会”展出,恰是寿县铜器逐步进入公众视野之际,唐

①刘雨:《唐兰先生的治学之路》,《故宫博物院院刊》2015年第5期,第140页。

②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并考释序》,《唐兰全集》第6册,第195页。

③刘体智辑:《善斋吉金录》礼器录卷三,上海图书馆影印本,第1函第4册,2000年,第93页。

④唐兰:《作册令尊及作册令彝铭考释》,《唐兰全集》第1册,第388页。

⑤唐兰:《寿县所出铜器考略》,《唐兰全集》第1册,第361页。

兰此文可谓应景。

唐兰在信中提出,想要得到刘体智“两壶一匕”的资料,是指刘藏曾姬无恤壶和刚汉釜陈勺(今名匕),皆寿县所出而特为学界瞩目者。本来,壶、匕刘体智各有两件,同型同铭,并非“两壶一匕”,唐兰写此信时似不甚清楚,临近文章发表才改正。两壶两匕的铭文拓本在刘体智1934年初印成的《善斋吉金录》中都已著录,前者在《礼器丙》,后者收入《度量衡》中,唐兰虽不会没有见过《善斋吉金录》,但该书器型为图绘,或许唐兰想得到更加逼真的器物照片。容庚1934年2月5日写给刘体智的信(刘氏后人所藏)就说:“顷由中国实业银行转来大著《善斋吉金录》两函,拜读一过,藏弃之富,足媲《博古》、《西清》,钦迟无已!另二部已代转中舒、锡永二君。尊藏曾姬无恤二壶、刚汉釜陈二勺,皆寿州所出,乞赐拓本,余不敢多索也。”有了印本,还想要得到更为珍贵、清晰的拓本、照片,看来不是个别学者的奢望。根据下揭唐兰第二函“昨奉手翰,并拜尊著之赐”的回复来看,唐兰应该得到了他想要的资料,“尊著”应该就是刘体智的《善斋吉金录》。因此,也就可以判断,唐兰第二函应在第一函稍后不久,在《国学季刊》正式刊登的《寿州所出楚铜器考略》一文已经附有刘氏藏器的照片与拓本了。

唐兰向刘体智打听另一件在上海的寿县铜器楚王酈肯鼎,也是出土于朱家集楚王墓。“肯”字,后有读为“前”、“延”等字者,但在当时,包括唐兰在内的学者多写为“肯”。当时坊间一直传说此器藏于“沪上朱氏”,但朱氏何人,众皆莫晓,颇为神秘。唐兰曾见到过郭沫若寄来的此器照片,而郭沫若的资料,应是由金祖同自上海寄出的。郭沫若旅居日本时,曾有一封写给金祖同的信,其中说:“承示楚王鼎拓本三件,敬谢盛意……仆自憾于原器无缘接近,于尊疑亦无可贡献也。今尚有欲(扣)[叩]问者,该器全体作何形,其分量尺寸曾加衡度否?上海有照片出售否?如有照片出售时,能代为购寄一张尤所切望。”^①此信曾被认为作于1936年,但根据蔡震在《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考辨》中的考证,应作于1934年2月12日^②。这与唐兰文章的说法相合,大概郭沫若在写此信后不久,便收到金祖同寄来的照片,并转给唐兰等人看过。金祖同(1914-1955),字晓同,一字寿孙,有笔名殷尘等,与唐兰为小同乡,回族,是上海中国书店老板金兴祥之子,曾随鲍鼎、叶玉森治古文字之学,又从郭沫若、卫聚贤等游。他这一时期在刘家为刘体智收集整理甲骨书拓。就这些关系来看,唐兰向刘体智询问“沪上朱氏”楚王酈肯鼎等消息,并非没有来由。但朱氏似乎不愿向外界透露自家信息,不知刘体智给唐兰的回信是如何作覆的,唐兰第二函也没有再提起。此批寿县铜器最初由安徽乡绅朱鸿初、朱吉祥等朱氏族人挖掘,上海朱氏疑亦与之有关。

①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24页。

②蔡震:《与金祖同书简及与其人相识》,《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考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50-351页。

唐兰第一函谓与安徽图书馆商定,秋间去整理楚器,并预约“道出沪上,当再奉访也”;《寿县所出铜器考略》也说“顷藏安徽图书馆者,余亦尝见其拓本及照片……余既与馆方约,将以假日往彼,详为考证,再为发表”。在唐复年、唐益年所作的《唐兰年表》内^①,查不到唐兰有到过安徽的记录,不知他是否成行。颇疑此行推迟至1935年初,“秋间”学校还要上课,而年初则属寒假期间。唐兰《殷墟文字记·释丁》曾有一段话旁及行历,记“顷岁寿县所出楚器群内有铜方版千余,余曾见之于安徽图书馆,殆即金版也”^②,那么他确曾去整理过楚器。在这一时期与唐兰颇多交集的容庚的《颂斋自订年谱》中可以发现,1935年1月14-28日,容庚“为伦敦展览会事,与唐兰赴南京、安庆、芜湖、上海、杭州、济南。同行有容肇祖夫妇及张荫麟”。所谓“伦敦展览会事”,指当年11月28日至翌年3月7日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Royal College of Art)举办的中国艺术展览会,事实上,国民政府教育部早在1934年即开始筹备此事了。唐兰为此作有《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铜器说明》^③,其中提到此次展览会共展出寿县出土青铜器四件,而唐兰念兹在兹的那件楚王酈青鼎赫然在焉。如此看来,他的确实践了与安徽图书馆的约定。唐兰在《“商鞅量”与“商鞅量”尺》一文中又说:“合肥龚心铭氏景张所藏商鞅所作量,马衡氏以其铭及拓本考之,疑其所用尺当与刘歆铜斛尺同。二十四年二月,兰以审查铜器滞沪上,因刘晦之先生之介,并鲍扶九先生之导引,乃得观其量于龚氏后人。”^④据此,可知在1月底为中国艺术展览会调查安徽铜器之旅结束以后,唐兰未与容庚等人一同返回北平,而是到了上海,并拜见了刘体智以及鲍扶九,也就是鲍鼎。这样,他信中所说“道出沪上,当再奉访也”的前约,也便有了着落。

二(图见封二)

唐兰致刘体智信函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补足了他赴安徽为中国艺术展览会选定青铜器展品的一段早年经历,更重要的是,唐兰佚札第二通有几句透露出了几乎被人遗忘的学术史信息。该函录文如次:

晦之先生惠鉴:

昨奉手翰,并拜尊著之赐,感谢感谢!北大所藏甲骨,将由兰编释印行,秋间可以付印。尊藏最富,闻亦已编就,南归时拟奉访一读也。此复,敬颂日祺。

唐兰拜,北平外交部街甲二号。

其中提到编释印行北大所藏甲骨云云,学界一直语焉未详,而唐兰在此夫子自道,声称“秋间可以付印”,不免令人兴奋。由于刘体智是罗振玉之后最大

①见朱立乔、吴騫主编:《嘉兴文杰》,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第527-541页。

②唐兰:《殷墟文字记》,《唐兰全集》第6册,第170页。

③唐兰:《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铜器说明》,《唐兰全集》第3册,第442-459页。

④唐兰:《“商鞅量”与“商鞅量”尺》,《唐兰全集》第2册,第538页。

的私人甲骨藏家,所以唐兰大概很愿意跟他谈起自己甲骨研究的业绩。

1934年是唐兰研究古文字的一个高峰,他的《殷虚文字记》、《古文字学导论》等重要著作在此时基本完成。但是他这一时期整理过北京大学藏甲骨,则鲜有人知。北京大学历史上曾有多次入藏甲骨的记录。据董作宾、胡厚宣《甲骨年表》载^①,1922年,北平古玩商达古斋主人霍保禄(明志)以所藏甲骨,捐赠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凡463片,这是早期较为重要的一次甲骨捐赠。另据2008年出版的李钟淑、葛英会《北京大学珍藏甲骨文字》一书,1936年另有一次甲骨入藏;至1960年代统计,旧北大所藏甲骨经缀合后总计1831片^②。数次入藏甲骨中,仅有霍保禄捐赠的一批是唐兰在1934年前后最有可能接触到的。唐兰信上说他整理北大所藏甲骨,而且已到了即将出版的阶段,这是甲骨学史上很少提到的事情。《北京大学珍藏甲骨文字》于此即付阙如,该书利用了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相关档案,却并没有涉及到唐兰。1934年前后,唐兰还兼任北京大学教职,由他负责整理国学门甲骨的工作,是完全可能的。可是,在上引《唐兰年表》中,也仅有1932年“春,代顾颉刚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讲授《尚书》。秋,先后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师范大学任讲师,讲授金文、古籍新证及《诗》、《书》、三礼(《仪礼》、《周礼》和《礼记》),旋又代董作宾讲授甲骨文字”的记载^③,似依《天壤阁甲骨文存并考释序》而改写,没能提供有关唐兰与北大国学门甲骨关系的任何信息。

其实,此前学界对这件事情还是有一定了解的。1950年代初,胡厚宣出版《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记“一九一七年有大批甲骨发现,卖给了王襄和霍保禄……霍氏之物,则于一九二二年捐赠给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由唐兰编为《北京大学藏甲骨刻辞》一书,迄今未能出版”^④。引注为《考古社刊·社员著作表》。检1934年12月《考古社刊》第一期《社员著作一览表》,列有唐兰《殷虚文字记》、《北京大学藏甲骨刻辞考释》两种,皆未印行。胡厚宣早年另有《甲骨文材料之统计》一文,刊登在1937年4月2日的天津《益世报·人文周刊》第13期,开明书店《月报》第1卷第5期有转载,其中“已编未印者”内,有《北京大学研究所藏甲骨刻辞》,云著录463片,且谓“一部分已著录于《殷契佚存》及《殷虚书契续编》”。此处虽未点出唐兰名讳,但“463片”之数与霍保禄所捐数量相合,也是一旁证。此外所见,则仅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曾毅公《五十年来之甲骨学》1951年稿本(承国家图书馆古籍部金石组赵爱学副研究馆员惠告)

①董作宾、胡厚宣:《甲骨年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5B页。

②李钟淑、葛英会:《北京大学珍藏甲骨文字·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页。

③唐复年、唐益年:《唐兰年表》,见朱立乔、吴騫主编:《嘉兴文杰》,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第529页。

④胡厚宣:《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载宋镇豪、段志洪主编:《甲骨文献集成》第34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和张秉权《甲骨文与甲骨学》^①等著作零星提到过唐兰整理北大甲骨此事了。

所幸除上引致刘体智第二函外,唐兰自己还提及过一些线索。在写此信将近五年之后的1939年3月19日,他撰有《天壤阁甲骨文存并考释序》云:“刘复氏属余撰集北大所藏卜辞,易稿三次,因循数岁,而刘氏墓有宿草矣。经变后始为编定,刊传之期,尚未知何日也。”^②五年之间,“秋间可以付印”的说法竟变为“刊传未知何日”了,未免令人唏嘘。刘复(半农)本人虽不专治甲骨学,但他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委员,委托当时研究甲骨声名鹊起的唐兰处理此事,是很可能的。刘复一生,留传文字不鲜,可惜长期以来未能全部结集,现存他去世前半年的日记,1934年4月27日下午记有“与沈仲章由唐立厂介绍,到尊古斋测验所藏古镜之音律”之事^③,推测他在考古领域对唐兰藉重颇多。今检台北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有《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藏殷卜辞》墨拓五册,其1-4册题“甲骨刻辞”,第5册名“凡将斋所藏甲骨文字”,钤有“镗家书库”印记,应即刘复之印,又有“凡将斋藏甲骨文字”印记,则属马衡所藏。马衡亦曾任北大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至此,刘复拜托唐兰整理北大甲骨一事已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刘复旧藏的此一原拓,尚无缘目验,但据看过这部拓本的严一萍在1980年4月说:“六十年来,该批甲骨,仅有拓本四册流传,未见有专书影印或考释。”^④严氏遂自行考释出版。据此可知,《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藏殷卜辞》仅为拓本而无考释,可能是当年所拓的众本之一,并非唐兰《考释》的稿本,而且严一萍对唐兰曾经参与其中的事实可谓毫无所闻。不过,严一萍与唐兰籍贯皆为嘉兴秀水,二人先后考释此宗甲骨,也算是一段佳话了。

2012年11月17日举行的“中国书店2012年秋季书刊资料拍卖会”上,第142号拍品名为“唐兰手稿”,乃四册毛装稿本,内容为《甲骨刻辞考释》卷上1册及其他有关甲骨释辞者3册。由网上公布的照片可以看出,这部手稿写在绿格稿纸上,第一页题“甲骨刻辞攷释卷上”,署“秀水唐兰撰”。正文标题为“一卜人”、“甲邑”,则此书是以分类法对甲骨卜辞进行著录考释的。其第一片正面有四条卜辞,分别是:

贞小彡畀告于祖乙

贞舌方不亦出

告于祖乙

(舌)方(不)亦(出)

反面为贞人名字:

邑

①张秉权:《甲骨文与甲骨学》,“国立”编译馆,1988年,第123页。

②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并考释序》,《唐兰全集》第6册,第195页。

③参见刘小惠:《父亲刘半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65页。

④严一萍:《北京大学国学门藏殷虚文字考释》,艺文印书馆,1991年,第1页。

经查,这片甲骨的确见于《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藏殷卜辞》(严一萍《考释》1.5.4),原片尚在,《北京大学珍藏甲骨文字》(0776正反)也已著录。由此可以认为,这所谓的“唐兰手稿”至少应该包含唐兰未刊稿《北京大学研究所藏甲骨刻辞》的部分内容。虽然这片甲骨也出现在胡厚宣1951年的《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之《南北师友所见甲骨录》(2.52)中,但综合考虑,这份“唐兰手稿”恐怕不会是引用胡厚宣的著录而来。

《甲骨刻辞考释》卷上这第一片甲骨,其中“(舌)方(不)亦(出)”一条残缺,括号中的卜辞为唐兰拟定。但近年蔡哲茂的缀合(《缀集》39)显示,本条应作“舌方其亦出”^①,唐兰猜错了一字。另一条卜辞中有表示疾病之义的“𠄎”字,唐兰有一段考释说:

孙诒让释“瘳”,王襄释“疥”,郭沫若释“脉”,丁山释“疾”。兰案当释“𠄎”,读若“疾”。《说文》:“𠄎,倚也。人有疾病,象”【下阙】

这段文字前半部分涂抹过甚,删去的是丁山发表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的《说𠄎》一文的文献出处。遗憾的是,网络图片至“象”字而止,唐兰考释的主要内容不可得见。“𠄎”字许多人释为“疾”,不过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读胡厚宣殷人疾病考》、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𠄎》等亦主张释为“𠄎”较妥,支持了唐兰的说法。唐兰自己后来在《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也释为“𠄎”,但缺乏详细论证。倘若今后《甲骨刻辞考释》卷上能够公布,那么我们对唐兰的释读理念将可以理解得更加深入了。

三

北京大学国学门甲骨自1922年入藏,至迟在1925年时已有整理发表之议,这一年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卷第11期刊有一则《本学门丛书预备付印二十一种》的“学术界消息”,“甲骨刻辞”名列其中^②。此时唐兰才刚刚从无锡北上天津。待他在甲骨学上的造诣为学界所瞩目后,1934年正欲编释印行北大所藏甲骨,满以为“秋间可以付印”,可是人事倥偬,或许由于时代纷扰和北大甲骨陆续增加等因,唐兰始终未能完成此书,这份《考释》手稿长期没有面世,只留下蛛丝马迹,供人寻味。

唐兰致刘体智两函中提到的其他文物,也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各有不同的命运。矢令彝很早就被怀履光(Kelly Walsh)与卢芹斋盗卖出国,现藏弗利尔-塞克勒美术馆(Freer and Sackler Galleries)。楚王𡥉肯鼎隐秘多年以后,终于在1954年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刘体智的藏品星散了。他的甲骨1953年由文化部收购,并交拨给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打下了该馆馆藏甲骨的基础。

①蔡哲茂:《甲骨缀合集》,乐学书局,1999年,第69页。

②《学术界消息·本学门丛书预备付印二十一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卷第11期,1925年。

矢令尊和曾姬无恤壶,原本也运到了美国,是傅斯年下定决心请刘氏从美国追回来的,1936年底售让给当时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今存台北“故宫博物院”;而刚汉釜陈二勺,后归容庚,容庚复售其一与于省吾,如今分藏在广州市博物馆和辽宁省博物馆。唯有唐兰的两封信提示着,这些文物在历史的某个瞬间曾经有过交会。

唐兰致刘体智二函目前均保存于刘氏后人刘鼐龄手中。刘鼐龄曾将二函向史树青出示并邮寄复印件,史树青后于2000年1月21日回信云:“书札复印件均已收到,正值北京纪念唐兰先生百年冥寿,我带唐先生书札到会,会场复印分赠到会者,对刘晦之先生为学术界之贡献,称赞不已。我将写《大收藏家刘体智先生》一文,将于春节间完成,届时寄上求正。”2000年1月9日,是唐兰百年诞辰。史树青提到的《大收藏家刘体智先生》,似乎未及写出。2005年11月,李宗焜经刘家授权,在台北整理发表了部分刘体智相关文献的录文,其中就有唐兰这两封信^①,可惜只有录文且稍有瑕疵,并未被《唐兰全集》的整理者注意到。任何“全集”都只是相对的概念,涉及到往来书信的部分尤其难以求全。除去写给刘体智的佚札两通外,唐兰的集外文字还有一些,此不赘。

【作者简介】张涛,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三礼学、学术史。

^①李宗焜:《刘体智与容庚往来函札》,《古今论衡》第13期,第4-36页。

思伯曾得其一部分，確不如此諸家所藏仿均不實目。和芳的書文後傳理必昂行此打，不知元修易於成此舉否。
錫永兄曾多年一行以學已返多矣，車中道以欲詳知一二，臨時似可得另有千由息也。將此函藏出銅器局報聞外係部力持者均已往探照，不知現時以何事中止傳為事靜不理。

擬於 和中館 廿五九

详参陈力《徐中舒先生遗札十三通笺释》一文

晦之先生惠鑒昨奉
手翰并拜
首第之賜盛謝、北大所藏甲骨將
由蔡編釋印行秋間可以付印
方藏最富間亦已僞就南歸時擬奉
訪一談也此復誠頌
日祺
老夢軒

详参张涛《唐兰早期甲金学研究表微》一文